

我的话剧情缘

王义(贵州话剧团)

自创

-

第一次看话剧还是在小学，是混进河滨剧场（今已拆平）看的，剧名是《赤道战鼓》，内容是讲非洲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我今天还隐约地记起剧中的几个片断。其中一个是一个美国军人（黑人）在奉命枪杀一个美军欲秘密处决的黑人姆旺卡。但正义的沃伦不愿屠杀黑人兄弟，反而射倒了监刑的美军。另一个是《赤道战鼓》中黑人把鼓夹在两膝之间作为信息传递而敲的鼓，他使我们学会了新的打击乐姿势，回到家里见什么都夹在腿中间乱敲一气（包括洗衣搓板），边敲边张着嘴鬼哭狼嚎一通。因为稍微有一点噱头，便会引来全班的大笑和掌声（特别是女生）。后将这段丛林舞蹈带领全班男生应用于对一女老师的恶作剧，把她吓哭了，为此而受到学校的严厉批评，差点被记大过，这是在 1964 年。

后又接着看了《马兰花》，记得当年我还拽着老猫的尾巴不放，怕老猫去害小兰姑娘，急得演员满头大汗。后来在话剧团笑谈此事，还被当年的老猫扮演者赵谦老师（电视剧《遵义会议》总导演）给了一壳拽。

还看过当时以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箭杆河边》、《千万不要忘记》、《家庭问题》《夺印》等话剧，学校还让每人写了一篇作文，我记得我的作文只有几个字：拉肚子，没有看。气得班主任满脸通红（班主任是个年青的女教师），不是没有看戏，而是写不出来，只好出此招了。

转眼到了文革中期，也就是 1970 年左右。正是全国响应毛泽东和“江青同志”号召，大力普及样板戏的时候。那时候，样板戏的每一个剧本，都是在中共权威杂志《红旗》上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以后各剧团演出，都要以此剧本为准。它的根据就是张春桥的一句话：样板戏改一个字，就按反革命论处。

当时，全国的文化活动基本瘫痪，收音机里，除了经江青批准重新改编的革命样板戏处，人们想听音乐，就只好听也是收音机里的广播体操的配乐了。所有的文艺时段，全是样板戏。对大人还好说一点，对孩子，从长远看，这无疑是一种犯罪——中国音乐教育本来就很失败，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不过，我还是与瞿小松（当今世界著名音乐家）他们偷偷地去所谓的“裴多菲”俱乐部（一种自娱自乐的小提琴团伙）听唱片，以最小的音量偷听封、资、修的音乐。不

过也是从那时知道了什么是民乐，什么是西洋乐，不知谁拿来一张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可惜只有一小部份，虽不甚了解，却也大概可以期分话剧与京剧。

从 1968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终于熬到了 1972 年，阴差阳错，我也从知青变成了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在与老同志的交谈中得知：贵州省话剧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赣东北军区文工团，后改为二野五兵团文工团，解放后改为贵州省委文工团、省人民文工团和省民族歌舞团话剧队，1956 年 5 月 23 日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决定，贵州省话剧团正式成立，以后中央支援边远省份，又陆续从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和各兄弟文艺团体分配和安排部份优秀生进团，为该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了 50---60 年代在全国排得上号的话剧文艺团体。

我看到的文革话剧内容是写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小剧，剧名叫《半蓝花生》、《永不停摆》《红管家》，记得第一次看这三个小戏是在小十字评剧团剧场。后来这三部小戏还到工矿去巡演，很是受到欢迎。我因要办理有关入团手续，所以没参加。当时，政治环境宽松了不少，被驱赶到农村、工厂去搞“斗、批、改”的话剧演员又风尘仆仆、百感交集地回到了城市。

1973 年贵州省话剧团在恢复排练《艳阳天》的第一天，大家刚刚坐在一起对台词，就对不下去了——人们失声痛哭——终于又可以演戏了……紧接着又排了《枫树湾》参加全省的拥军优属慰问演出，很是受部队欢迎，大家都很满意部队的伙食，巴不得天天慰问演出。

记得 1975 年到北京参加全国话剧调演，是我团集体创作的话剧，剧目《云顶山》是反映农业学大寨的。因演反面角色的演员不胖，没法，只好让服装张明贵师父做了一件“胖袄”才解决问题，哪象现在生活好了人人都在减肥。后来在人民剧场看电影《开山的人》，发现电影情节，台词与《云顶山》基本一样，连男一号都是我们团的井立民扮演的，只可惜当时没有知识产权保护。

转眼到了 1977 年。那年夏天我乡下探亲，寨子里的人说，你在话剧团，你们剧团又在演什么戏？话剧团是干什么的。农村人嘛，啥也看不到，啥也不知道。说实话，当年无法解释清楚，直到现在也解释不清楚。

接着，在 1978 年便看到了《白卷先生》，我们话剧团也排演。作者是辽宁的剧作家。这是一部写“白卷先生”张铁生的讽刺话剧，张铁生在剧中叫刘铁生，剧本写的很热闹，逗得全场笑声阵阵。当刘铁生说出“三七二十八”时，观众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那时的观众真好。

后来听人说，四人帮被打到后，张铁生被拉到大辽宁体育馆批斗，装在一个笼子里。愤怒的人们冲过警戒线，将吐沫和粘痰吐得他满身满脸……

直到今天，在网上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帖子——张铁生应当向全中国的老知青谢罪！你一张白券，毁掉了多少人的前程？！

当年，我与本团的哥儿们吹牛。这位同仁（已退休）比我大，是省内外著名的导演、剧作家。一次，我谈起以前看的那部《赤道战鼓》话剧中的黑人鼓手，那位同仁笑着说，老弟，知道这部戏中的鼓手是谁的吗？我说谁？他微笑而沧桑地用食指指着自已说：是哥们儿……该同仁还提起当年演《小足球队》、《英雄小八路》、《抓壮丁》排演时的佚文趣事，真让人忍禁不住。

此时还有一部话剧不能不提，作者是贵州省话剧团的剧作家：曹宇文、孔凡祥，剧名是《难忘的年代》。孔凡祥就是中国第一部电视剧《她含笑死去》的作者。《难忘的年代》由省活最佳阵容出演，代文华在剧中形象地演出了“四人帮”垮台不久，国内各行各业积重难返百业待兴的局面，记得戏中有句台词：不能让他们毁了咱们的国家！每演到此处，台下一片掌声！该剧在当时很有震撼力的。还有王呐、赵谦 77 年创作的《挡不住的东轮》，全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的剧作者唐佩林的《任尔东西南北风》。上述剧目在当时很有震撼力的。

那年，话剧团排演的《万水千山》、《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二次握手》、《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未来在召唤》、《一双绣花鞋》等在人民剧场演出，真是场场爆满，但是演出收入全部上缴。

印象最深的是在在人民剧场看文革后复排的《雷雨》。它使我从此对贵州省话剧团刮目相看——（这应该是国家级水平，我现在仍然希望着）。用不着再描述他们演绎的如何，只要想一想电影《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配音演员张海玲——她曾是贵州省话剧团的演员，可以想象当年《雷雨》剧组的实力。

曹禺的《雷雨》几乎具备了话剧所必须的全部要素。严谨的结构，丝丝入扣的伏笔、层层推进的情节、激烈的矛盾冲突，清晰的人物关系、逻辑性极强的悲剧结局……特别是林薇、刘学文、金匡民、廖爱惠、施百萍等老演员精湛的表演，曾引得台下多少人黯然泪下。当年的《雷雨》在人民剧场演出时，盛况空前，就连本团演职人员，每天只能买到 2 张票。不过那年代的还不兴走后门。

其实，当时最为轰动并引起海内外广泛报道的话剧是《于无声处》。这台由上海剧作家宗福先创作的话剧，以丙辰（1976）清明的天安门事件为切入，讲述了一个在民族危亡时刻，不向现实低头的青年人的故事。这部话剧很快成为思想解放的先声，在客观上，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奠定了舆论上的基础。“于无声处”取自鲁迅的诗句“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很贴切，把 1976 年 10 月 6 日前的政治环境，形象地勾画出来。这出戏红遍全国，演遍

全国——全国各个剧团都排演了这出戏，又在后来拍成了电影。电影使时空更加舒展，但却侵蚀了舞台剧那种层层推进的紧迫节奏和现场感。当然，影片拍的很好看。宗福先也因这个剧作而获得了1千元的奖励。这在当时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举措！我就是通过贵州省话剧团排演时认识的这部话剧，当时从导演到舞美设计都一再叮嘱，景片制作一定要认真把好质量关，因为事关话剧团的荣誉。哪象现在的舞台美术技师，连个椭圆都不会画。

记得84年，去上海参加第一届上海艺术节，虽然住在上戏潮湿的地下室，仍然看了上海青艺的话剧《中国梦》和上海人艺演出的澳大利亚的话剧《想入非非》。特别是《中国梦》象一道闪电在沉寂的上空划过，给话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它将云南民歌“小河趟水”作为主要音乐多次贯穿于剧中，这或许为云南民歌走向全国起了端倪。当时看话剧也只是看看热闹和到上海去采购，因为上海的日用品不要票证，能公费旅游就很知足了，对该艺术节中的话剧异军突起没什么感受，不过倒是觉得澳大利亚的话剧《想入非非》全场由一人从头演到尾，100多分钟呢，作为演员，能演这种话剧——太过瘾了！

1987年，我已被借用到省文化厅艺术研究室工作。那年的秋天我出差，最后一站是北京。顺便去了我的当年的贵州省歌舞团的羽毛球朋友严冬（现广东音乐学院付院长）所就读的中央音乐学院。朋友问我有什么阴谋？我说，看《茶馆》。他叫了一声，哎呀，今天正好人艺演这出戏！于是便直奔人艺剧场，当看到场外的等票者是场内坐席的三倍以上时，于是便悻悻地重新返回中音……

还有一部话剧很值得一提，就是贵州省话剧团王呐等剧作家创作的《春光惹人醉》。该剧的主题似乎是——这是大陆自49年以来，第一次在舞台上表现国内生活负面的真实状况的剧作，她的意义是——中国的话剧重新回归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

后来在电视中看到了一部电视剧《黄兴》。好！主角竟是马少华。这也曾是贵州省话剧团的人啊。当年演出话剧团《通天关》，他很认真，根据剧情要求，寒冬腊月还光着膀子赤足上台演出。此君后来在多部电视剧中演主角。我喜欢他的表演，用现成的话形容那就是——很有责任心！其实马少华和我还是幼儿园的同学，是他从部队文工团服员到话剧团时，有一天问及此事，当时还弄得我一头雾水。经他提起幼儿园打架之事，才恍然所知

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尽管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束缚和文革的残酷洗涤，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话剧创作如集聚了多年的火山岩浆，在开阔的火山口处尽情喷发！但很快，剧作家们对自己的创作不满意了——现实主义回归固然是好事，但这种流派上的一花独放终究不是好事。于是，幽灵般的新思潮在话剧界游荡、徘徊……终于，令人目瞪口呆的作品出现了——《如此孝顺》。

《如此孝顺》在艺术上进行的大胆的探索和创新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该剧让贵州省话剧团前后有4个小分队在全省范围内巡回演出几百场次，时间达两年之久，该剧的巡演的确也象小分队的领头人承诺的那样，除了按六.四比例上缴话剧团，小分队每人劳务费是可以买一台200多元的洗衣机，这让大家向小康又迈进一步。有一件事不得不提，当时我们正好与贵阳市文工团的《如此孝顺》剧组撞车，这真是对台戏了，第二天得知该剧组转移，临行时留下一句话：倒霉！

当时一块巡演的《酸甜苦辣》、《哥儿们折腾记》的卖票率比《如此孝顺》少多了。

话剧《波特小姐》故事，讲述了年轻的波特她与出版商诺曼·沃恩之间的情感波折，以及她对世界的认知如何转变。另有一部我省自创的话剧《鲁迅与瞿秋白》，它描写了鲁迅与瞿秋白不同寻常的友谊，展示了鲁迅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硬骨头精神。1984年那年《鲁迅与瞿秋白》、《波特小姐》还与我省少数民族作家伍略创作的话剧《枪与锄》到上海、无锡、常州等地巡演，当时还得到当地新闻媒体的好评。

但在各界引起极其强烈的轰动的，还是历史剧《四渡赤水》，当年在红旗剧场（现也折平）正在上演的《西安事变》停演，让位于《四渡赤水》，当时许多人都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同样都是政治任务呵，为什么《西安事变》就得让位于《四渡赤水》，不过大家还是愉快地服从了领导的安非，只要有戏演。

象《雉愿》、《小院春秋》、《红星与十字架》、《疾风劲草》、《母亲河》《泥巴人》、《情人》等戏，因借用在外当“文化背兜”，所以未能参加，甚为遗憾！

《茶馆》是90年第11届亚运会期间在北京看到的。

当年，我参加由贵州省文化厅组织的“贵州省民间文化艺术团”去北京参加《中国（贵州）傩面具艺术展》。有一天正下大雨，根本没人参观，突然有一人冒雨独来观看，因为馆里只有我一人值班，出于无聊和好奇，我操着“贵北话”耐心地给他当讲解；解释什么是傩，傩文化在戏剧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把国内名流的题辞给他介绍，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曹禹先生的题辞。当他得知我是贵州省话剧团的工作人员，就送我3张票。所以就看了北京人艺的《茶馆》和《推销员之死》。另一张票是在北京大剧院着歌剧《茶花女》时，才知道送票给我的就是在亚洲次于小泽征尔的台湾国立大剧院的指挥、艺术总监---曾道雄先生（当时任《茶花女》乐队指挥）。

不讲《茶馆》这出戏了，只讲花絮。听曾道雄先生讲：《茶馆》在法国演出时，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打上中文字幕，大家都很担心，担心欧洲文化中心的高卢人看不懂。演出结束后，谢幕时的掌声长达15分钟……但还得讲一句《茶馆》中的于是之、蓝天野、郑榕、英若城的演

技、台词，用北京话讲：盖帽了！后曾先生又到展出场地，专们送了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的《舞台美术选集》、《首都舞台美术设计资料选》两本书，说或许对我的专业有用。很遗憾，当时应让曾先生签名留念，咱以后有机会去台湾也好溜光溜光。

1995年，贵州省话剧团演出了《情人》。因为《文化广角》要拍剧照，我去看了。掐指算来，一晃儿有七、八年没正经看一部话剧了。看到一半才知道，舞台上也有床上戏了！我记得演到此处时，场内一片暧昧的寂静，灯光师蓄谋已久的灯光，结成一束，聚集在由一帘薄纱遮掩着的双人床上，很是情色。

再后来又看了《泥巴人》，是一部外国作品。主题很深刻，情节扣人心弦。该剧为小剧场话剧的开拓与发展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让我骂娘的是，主要演员都使用了胸麦，这样，声音在整体上便严重失衡，过去那种话剧语言的声音魅力荡然无存……不过该剧还应邀到新加坡作交流演出。

贵州省话剧团演出的《蔡文姬》没有看过，但它丢放在木工房的说明书我却保存着——因为当年（1973年）不懂历史，但我觉得说明书上的“胡笳十八拍”文字太美了，所以就得以留了。幸运的是82年（？）北京人艺来红旗剧场演出该戏，让我感到了她的震撼魅力，后团内一老同志告知：我团林薇扮演的“蔡文姬”与人艺“蔡文姬”的扮演者朱琳不相上下，曹操的扮演者王呐演得真像曹操。本人曾从老导演罗军（其与上世纪30—40年代《夜半歌声》宋丹平的扮演者金山齐名）口中得知：林薇在《文成公主》的演技比《蔡文姬》更胜一筹。

当年在省内巡演《魂牵万里月》时，我的一个忘年交（此人已作古，老天保佑他老人家！），当年在《东进序曲》中饰演日本军官。此公对当年的《龙须沟》、《西望长安》、《白日梦》、《骆驼祥子》、《三代人（后来的《红灯记》）》、《幸福》、《渔人之家》、《森林中的火光》、《东风四号》、《同甘共苦》等剧的演出，如数家珍颇为感慨的，今不如昔！每当聊起当年的往事，（他曾在西北军平过，好象是扬虎城的卫队。）特别是说到扬虎城将军和他比个儿头的事时，还颇为自豪——杨虎城将军没他高。当年巡演自办伙食，此公自愿充当伙头军，但他一点不揩大伙的油。每天演出完毕（当时是自带行李家什），此公就自掏腰包煮一小锅猪肝汤，烫一瓶包谷土酒，凡愿沽酒者皆欢迎，品酒之间，经常告诫小年青如何敬业如何做人。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将眼前的这一慈祥老人与舞台上凶残的日本军官联系在一起，可见此公演技之高。

随着电视的普及，娱乐方式的日益多元化，话剧终于在某一天和电影一起，在享受了空前的辉煌后，归于寂寞与孤独。我非常怀念那个年代，那个话剧的黄金时代。那些年，一年至少能看三部话剧！而后来，三年也看不到一部话剧了。还有一点聊以自慰的是：“北焦（菊隐）

南黄（佐临）亲自导演的《茶馆》、《中国梦》有幸得以观看。所不是我薄情，是当时的话剧团已处于解体和半解体状况。不说外地，单说咱们贵阳，从贵州省话剧团走出去，现在在影视界成为大腕的有多少？以上世纪80年代因《西安事变》在全国闻名的“蒋介石（孙飞虎）”，调“四川人艺”的朱德的扮演者---刘怀正，《毕升》的芮启华，《黄金梦》的赵秀丽，《黑猫旅社》的夏宗佑、……还有一些进入教育界的，《红楼梦》林黛玉的配音张海玲、《潘汉年》的妻子贺筑平，。光是话剧团改行的人员，从舞台美术到编剧导演，完全可以再成立一两个话剧团，大江东去啊……

后来在广告界混时，的确是冲着对《良家妇女》的作者李宽定的仰慕之情去的，此君当时创办了一个广告公司。后来知道话剧界在此行当的人越来越多。有演员，有舞美，有编剧，有导演，给我的感觉是，话剧界的变相下岗和工厂差不多，而且大多投靠广告、影视、教育界！而且在我工作的广告公司里，有分别来自话剧团、京剧团甚至木偶剧团的演职员！他们有的作秘书，有的作业务，有的作出纳或者会计……话剧界已属“弱势群体”。

在得知贵州省话剧团的编剧犹学忠的《业余警察》、《谋生》（获中国话剧研究会西南分会颁发创作奖），由潇湘、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时，心想，这种转移真明智，打心眼敬佩。

这一时期话剧团的日子过得苦啊，甚至排演小学生教学剧，都成了维持生计的重要一块！偶尔有个主旋律剧目，也算是一个“经济增长点”。记得《托起明天的太阳》1个月就连续演出60余场，真不容易。当我听说该团的小品剧《川军兄弟》在全国还获了奖时，打眼里敬佩这帮哥儿们对话剧事业的热爱。

1998年四到了又恨又爱的话剧团，明摆着是冲着职称和养老去的。剧团当年就排了两个自创的话剧《在睡着的地方醒来》、《巧妇可为》。为了要评职称和要务正业，颠三倒四地写了一篇《在睡着的地方醒来》的评论，嘿嘿！居然还混得了200多元的稿费。

2002年在南京艺术节居然还看到了北京人艺的《生死场》、上海人艺的《商秧》、福建人民艺术剧院的《沧海争流》、南京市话的《秦淮人家》……各文艺团体的演出精彩纷呈，同行的演技令人敬佩，但他们每一剧目几百万的投入，真让人瞠目结舌！

贵州省话剧团后经过精心打造的《红帆船》（当年还获“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的确好看了，该剧的确起到了对青少年教育的宣传作用，虽然有省教委颁发的希望各学校配合演出让学生接受教育的红头文件，但却无法到校园演出，因为北京请来的舞美设计师只注重了舞台“可视性”，而忽视了整个剧目演出的“可操纵性”。几十万元打造的一台让广大青少年受教育的戏没有达到目的-----真可惜！

另一台我省自创的《青春百分百》话剧真把我弄糊涂了，应该让堂堂正正的贵州省话剧团演出的剧目，文化厅怎么会拨款让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表演系的学生去演呢？想一想，也只好认为贵州省话剧团的人年龄大了，不青春了。听说该剧参加全国大学生汇演还获了奖，很欣慰，这下话剧事业后继有人了。

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认识了一位搞话剧的老师。此人牛高马大，音如洪钟，是中央戏剧学院（成人教育学院）院长——麻国均。在整个“2003 梵净山国际侗文化研讨会”的会上，就听他富有感染力的讲演。不过，在完成他的学术研讨后，他就惟妙惟肖地学他们顶头上司不懂戏剧装懂戏剧的样子，差点没把我们笑背过气去。后来当我问他斯坦尼的“体验说”和布莱希特的“表现说”和梅兰芳的“意象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时，他很吃惊，得知我们是同行便成了朋友。他每次吃饭都走过来坐在我的身边，不过酒后他也质问我：咱们搞话剧的真不务正业，跑来乱侃一通什么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侗文化侗戏干吗？！——真逗。当我谈到曹禺先生对侗戏的评价时，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喔，还有一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东洋鬼子”也插了进来，想和我们攀谈，因怕他是“文化特务”，害得我们说话都小心翼翼的。

话剧是外来品。自五·四运动以来，自“文明戏”在中国诞生以来，中国话剧的经典作品绝对对是凤毛麟角。到了今天，经典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很遗憾的是，我省有些话剧是排出来后，彩排一场，（审查）汇报演一场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也有演员比观众多的尴尬展示。唉！真期待着有一天，人们能够走出家门，悠闲而欣喜地走向自己所在城市的剧场，接过一份剧目单，走进座位，耐心等待着大幕的徐徐拉开，兴致勃勃观看着。在中场休息时，大家喝着冷饮或热饮，饶有兴趣地谈论着刚刚看过一半的戏，评判演员、剧情、舞美、灯光，预测结局。在全剧结束时，全场起立，为艺术家们的演出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欢呼；年轻人将手中的鲜花抛向舞台——台上，是艺术家们一次又一次眼含热泪的谢幕，合影留念……

上述的想法并非不可实现，2005年广东省话剧院来贵阳演出的《疯娘》就达到了这一期望。为此本人还发自内心的感慨，写了一篇《伟大的母爱——无场次话剧“疯娘”观后感》，虽然得了百多元的润笔，但是物有有值。

只不过心里最大的遗憾是话剧100周年纪念，全国各兄弟文艺团体都在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打造精品，上海就投入1000多万元来打造《红星照耀的中国》，听说还让一个叫大山的老外扮演斯诺，真让人妒忌。今年咱们贵州省有几个非常热爱话剧的老艺术家不顾年迈多病还在复排上世纪的《黑奴恨》，可歌可泣！

是的，对话剧艺术的追求是不受年龄和职业的约束，特别是在当今的年代。其实只要上下一心，我想还是应该有所作为的。咱们贵州省话剧团能否再打造出一个比当年《建设时期的游击队》还叫响的话剧呢？我期待着！

厦门大学图书馆